

「半跏思惟像」再探

李玉珉

前言

我國早期的佛教藝術中，常可發現一種姿勢閒適，神態優美的菩薩像。它的一足下垂，另一隻腳橫放在這垂足的大腿上，一手支頤，作思惟狀，以一指或數指微觸面頰，另一手則放置在翹起的腳上，這種菩薩像通常稱作「半跏思惟像」。半跏思惟像的製作不僅在我國南北朝時十分盛行，就是在韓國和日本的早期佛教藝術中亦時有發現。（註一）

過去數十年裏，不少學者，如水野清一（註二）、郎原三郎（註三）、素柏（Alexander C. Soper）（註四）、莫蘭（S. F. Moran）（註五）、桑德爾（E. Dale Saunders）（註六）、佐佐木（Rei Sasaguchi）（註七）等，都曾討論過半跏思惟像的問題。他們的研究心得提供了我們不少寶貴的資料，但是其中也有不少值得再商榷與再檢討的地方。比方說，誠如許多學者所主張的，樹下思惟像必定是太子思惟嗎？龍樹思惟真的就像水野清一講的，當爲太子思惟菩薩嗎？這些都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此外，學者們有時稱半跏思惟菩薩爲未成道前的釋迦牟尼——悉達多太子（註八），有時又說它代表著彌勒菩薩（註九），但是他們均未明確地指出二者的分野在那裏，我們應如何去區分這兩類半跏思惟像，這更造成了研究半跏思惟像的困擾。同時，他們均不曾對印度的半跏思惟像作深入地探討，以致我們無法確定，在半跏思惟像的發展史上，我國究竟扮演著一個什麼樣的角色？有著什麼樣的貢獻？因此，半跏思惟像仍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研究的課題。本文僅是作者整理半跏思惟像資料的一些心得，希望對這類菩薩形象的起源及發展能有一較全面的了解。

此文的重點將放在印度與中國二國，由我們對印度半跏思惟像的認識，可以明瞭半跏思惟像的淵源；而從我們對中國半跏思惟像的了解，則可指出此種菩薩像在我國發展出來的特色，並可用來作爲研究東亞其他國家半跏思惟像的基礎。本文分爲兩大部分，第一部分討論印度的半跏思惟像，第二部分則討論中國的半跏思惟像。又因根據造像記，有些半跏思惟像稱爲太子思惟，有些又稱作彌勒菩薩，所以第二部分的內容又可分成兩個單元，一是太子思惟像，一是彌勒思惟像。

壹、印度的半跏思惟像

在印度何時才有半跏思惟像的出現？現存的印度文獻並沒有任何有關的記載，倒是在唐朝道宣所作的「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裏，我們找到了一些蛛絲馬跡。它提到：「東晉徐州吳寺太子思惟像者，昔晉沙門法顯勵節西天，歷遊聖迹，往投一寺，大小逢迎。顯時遇疾，主人上座親事經理，勅沙彌爲客覓本鄉齋食，倏忽往還，脚有瘡血，云：『往彭城吳蒼鷹家求食，爲犬所噬。』顯怪其旋轉之間而遊數萬里外，方悟寺僧並非常人也。後隨船還國，故往彭城追訪得吳蒼鷹，具狀問之，答有是事，便指餘血塗門之處。顯曰：『此羅漢聖人血也，當時爲覓食耳，如何遂損耶？』鷹聞慚悚，即捨宅爲寺，自往揚都求諸經像。……遇見婆羅門僧持此像行，曰欲往徐州與吳蒼鷹供養。鷹曰：『必如彼言，弟子是也。』便付像還至京，詔令模取千驅，皆足下施銘，而人莫辨新舊，任鷹探取，像又降夢示其本相，恰取得本像。東還徐州，每放異光。元魏孝文請入北臺，至高齊後主，遣使者常彪之迎還鄴下。齊滅周廢爲僧藏之，大隋闡教還重光顯。」（註十）在此姑且不論這段文字所記神奇故事的真實性，但由這段記載的內容看來，此對北朝佛教美術影響深遠的吳寺太子思惟像，是吳蒼鷹從一印度婆羅門處所得，所以太子思惟像似應源於印度。雖說「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裏並沒有詳細地描述此吳寺太子思惟像的形貌，但是中國現存的太子思惟像多爲半跏思惟的姿勢，故而吳寺的太子思惟像很可能就是太子半跏思惟像；是以我們可以推測，在五紀世初有些印度半跏思惟像應已作爲太子思惟像了。（註十一）

根據考古資料，印度在貴霜王朝時（西元第一至三世紀）就有了半跏思惟像。柯羅諾斯（Kronos）氏所收藏的一尊秣菟羅（Mathurā）菩薩像（圖一），它的頭光雖已破損，但像的本身保存的尚稱完好。勒拿爾（Martin Lerner）仔細地考察它的雕刻風格後，他推斷此像應是二世紀的作品。（註十二）這尊菩薩半跏而坐，右手舉起，二指觸頰。雖然雙目圓睜，不似沈思冥想，但是它的姿勢與半跏思惟像一樣，故稱它爲半跏思惟像似乎亦無不可。

柯羅諾斯氏收藏的這尊菩薩究竟代表誰呢？勒那爾指出，因爲這菩薩的華冠中有一手結定印的坐佛，它應是阿彌陀佛，因此這尊半跏思惟菩薩當爲觀音。（註十三）對這個說法本人却不贊同。不錯，頂戴手結定印的坐佛固然是觀音菩薩的一大特

惟像多代表太子思惟，或彌勒菩薩（見下論），却從不作觀音。基於這些原因，筆者認為柯羅諾斯氏收藏的半跏思惟像可能不是觀音。同時，又因半跏思惟這個姿勢和彌勒的關係十分密切，而彌勒菩薩的頭冠中又可住有一入定坐佛，故而推測這尊秣菟羅菩薩像可能是彌勒。如果這個推論正確的話，此像大概是現存最早的彌勒半跏思惟像之一。

除了柯羅諾斯氏的半跏思惟像外，作者僅知兩尊秣菟羅半跏思惟像。一尊現藏於加爾各答（Calcutta）的印度博物館（註十七），另一尊現存於秣菟羅的政府博物館。（註十八）因為這三尊秣菟羅半跏思惟像均穿著涼鞋，顯然是受到了犍陀羅（Gandhara）藝術風貌的影響。（註十九）許多學者（註二十）都曾指出，半跏思惟像的製作大概源自印度西北的犍陀羅。又因柯羅諾斯氏所

「半跏思惟像」再探

國立故宮博物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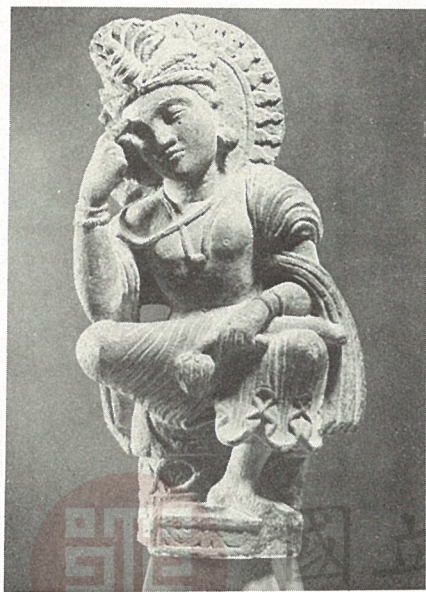
圖一 秣菟羅半跏思惟像 二世紀
柯羅諾斯（Kronos）氏收藏
取自 *The Flame and the Lotus* 圖版七

徵（註十四），可是在佛教美術中，觀音並不是唯一頂戴坐佛的菩薩。在雲岡及龍門的石刻裏，我們就發現了不少頂戴坐佛的交脚彌勒像（註十五）；而在貴霜王朝的美術中，亦有頂戴坐佛彌勒像的發現。（註十六）這些都明確地顯示，這尊冠中刻有坐佛的半跏思惟菩薩不一定就是觀音。不可否認地，觀音菩薩有時亦作思惟像（圖二），但這類觀音的姿勢都不是一足下垂，另一足橫置，而是一腿半跏趺坐，另一腿屈起的適坐姿勢，與我們所談的半跏思惟像並不相同。此外，在圖像學裏，半跏思

圖二 如意輪觀音 唐 取自「中國雕刻精品」圖七九

藏的半跏思惟像約為二世紀的作品，那麼我們可以肯定至少在二世紀時，犍陀羅已經有了半跏思惟像。只可惜在現存的印度文物中，我們尚未發現二世紀所製作的犍陀羅半跏思惟像。

筆者所知的犍陀羅半跏思惟像多為三世紀或三世紀以後的作品（註二十一），考察它們圖像學上的代表意義，我們發現並無固定的規則可循。如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所藏的一尊半跏像（圖三），它的頭部及雙手的前肘均已毀損，無法確定它是否作思惟像，可是它的左足下垂，右腳擱置在左腿的腿股之上，正是典型的半跏思惟像的坐姿；然而此像所乘坐的却是一輛兩馬拖拉的馬車，無疑地它應代表太陽神（Sūrya）。（註二十一）洛杉磯郡立博物館收藏著一尊四或五世紀的犍陀羅半跏像（圖四），此尊菩薩半跏而坐，右手作思惟狀，左手持未敷蓮花。泊爾（P. Pal）根據它左手的蓮花，直呼它為觀音。（註二十三）對於這個說法本人雖不盡同意（註二十四），但是在印度早期的佛教美術中，手持蓮花的菩薩確實與悉達多太子或彌勒菩薩無關。另外，拉或爾（Lahore）博物館所藏的一犍陀羅的浮雕殘片中也有半跏思惟像的發現。（註二十五）全片直



圖四 犍陀羅半跏思惟像 四至五世紀 洛杉磯郡立博物館藏
取自 *Bronzes of Kashmir*



圖三 犍陀羅太陽神像 四至五世紀 加爾各答印度博物館藏
取自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圖八九

圖九三
分數段，上面刻有佛、菩薩、及供養人等。依印格爾特（Harald Ingholt）的研究，這片浮雕乃在描繪佛傳的故事，其中包括了丈量佛身，衆人供養釋迦牟尼佛等

，而此半跏思惟像則是悉達多太子思惟。（註二千六）僅由這些例證，我們便可發現在犍陀羅藝術中，半跏思惟這個姿勢仍處於一泛用的階段。

綜上所述，半跏思惟像在西元二世紀時便已在印度出現，一直延用至四、五世紀，它可代表悉達多太子、彌勒菩薩，以及其他菩薩。所以我們可下下面這個結論，那就是半跏思惟這個姿勢，在印度的佛教藝術中，尚不具任何圖像學的特定意義。

貳、中國的半跏思惟像

在日本的一古墳中，發現了一面西元三世紀左右中國製的銅鏡。這銅鏡的背面紋飾裏，除了數尊小佛像外，尚有一半跏思惟菩薩像。（註二千七）水野清一指出，它可能是現存最古的中國半跏思惟像。（註二千八）雖說我們無法肯定這思惟像究竟代表那一位菩薩，但至少這面銅鏡的出現說明了三世紀左右時，半跏思惟這種圖像已自印度傳入中國。

五世紀時，半跏思惟像的製作日益增多，我國現存最早刻具造像記的半跏思惟像是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二）鮑纂所刻造的石像（圖五）。它的造像記云：「大魏太平真君三年



圖五 半跏思惟像 北魏太平真君三年（四四二）取自「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圖版一一 a

，歲次壬午，正月戊寅，朔十有八日乙未，永昌王常侍，定州常山鮑纂，單宦在台，減身口之儲，為父前邢邢令，亡母王，造茲石浮圖，大涅槃經一部。願皇帝陛下享祚無窮，父母延年益壽，父母將來生彌勒佛前。合門眷屬，普蒙十一餘福，子子孫孫，咸受福慶。」（註一九）此題記雖未提及這尊思惟像是那一位菩薩，但是「父母將來生彌勒佛前」這句話似乎暗示著，這尊菩薩可能與彌勒信仰有關。在敦煌二七五窟的佛像安排及圖像



圖七 敦煌第二七五窟北壁上層一佛龕 北涼 取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冊 圖十九



圖六 敦煌第二七五窟主尊交脚彌勒菩薩 北涼 取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冊 圖十一



圖八 像敦煌第二七五窟南壁全景 北涼 取自「中國石窟：敦煌莫高窟」第一冊 圖十五

設計上，我們亦可發現半跏思惟像與彌勒有著一種特殊的關係。敦煌二七五窟為一北涼石窟，約開鑿於西元四二〇年左右。（註三十）此窟的主尊為一交脚彌勒菩薩（圖六），窟壁的裝飾分為上下兩層，下層以壁畫為主，上層則雕有許多小佛龕，其中除了一尊半跏思惟像（圖七）外，餘皆交脚彌勒菩薩（圖八）。由此可知，敦煌二七五窟顯然地與彌勒信仰關係甚為密切。因此推論，在五世紀

初時，半跏思惟菩薩即已當作彌勒。半跏思惟像代表彌勒菩薩這個說法，在日本野中寺所藏的半跏思

惟像（註三十一）的造像記上得到了應證。此像鑄造於西元六六六年，像上的銘文直呼此思惟菩薩為彌勒。（註三十二）由於七世紀的日本佛教美術深受中國熏染（註三十三），所以我們可以肯定，在七世紀以前半跏思惟像在中國已被視為彌勒了。以上的論證雖然指出半跏思惟像可作為彌勒，不過，我們也不可忽略上海博物館所藏的天保四年（五五三）半跏思惟像（註三四），和日本大原美術館藏的另尊天保四年半跏思惟像。（註三五）根據它們的銘文，這兩尊菩薩像均為太子思惟像。試比較上述諸彌勒思惟像與太子思惟像，我們發現在造型上兩者並無差異，那麼，我們究竟應如何去區分這兩種半跏思惟像呢？首先，讓我們探討太子思惟像的特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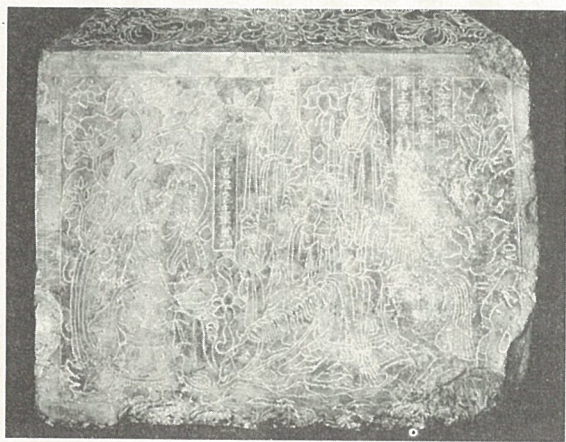
一、太子思惟像

水野清一在「半跏思惟について」一文（註三十六）中，曾對太子思惟像的問題作了深入的探討。他以為，太子思惟像的製作可能是以「過去現在因果經」及「佛所行讚」作為基礎（註三十七），主要是在表現悉達多太子未成佛時，就已經悲憫眾生，曾在靜坐思惟中，離欲界愛，得四禪地。（註三十八）同時，他在文中提到，縱使沒有題記，如在一半跏思惟像前繪有或刻有白馬舐足，或是在思惟像的背後有一樹木的話，此像必為太子思惟像。（註三十九）水野清一的理論雖然十分精闢，但是筆者不能全盤同意他的說法。

太和十六年（四九二）陰密縣郭元慶等刻造了一佛碑（圖九），它的銘文指出此乃一太子思惟像。（註四十）碑中有一菩薩半跏趺坐，雖然它的右手已毀，但它原來應該是作一思惟相。此處的悉達多太子並未披瓔珞，並且頂有肉髻，身著僧人袍服，儼然一副佛的模樣。它的前面尚刻有太子的白馬蹏跂屈膝舐足，及其隨從車匿跪地啼泣的景像，這都與「過去現在因果經」和「佛所行讚」所述，悉達多太子捨國出家，與他的愛馬和侍



圖九 太子思惟像 陰密縣郭元慶等刻造 北魏太和十六年（四九二）
「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
圖版五四b



圖十 六世紀 賓州大 佛像台座 學博物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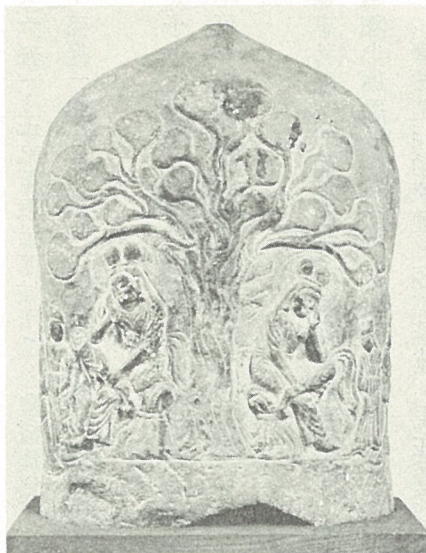
圖十一 石造四面像 隋 和歌山 高野山靈寶館藏 取自「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 圖版一九七c

者車匿別離的情況，互相脗和。類似的圖像在南北朝的佛雕中時有發現，例如賓州大學博物館所藏的一佛像台座，它的一面有陰線雕刻的樹下半跏思惟菩薩像，其前尚有舐足告別的白馬，和悲傷垂淚的車匿（圖十）。座上的題記為「太子思惟像主車莫和」與「太子成佛白馬舐足告圓像主鞏海□」，這都說明了這尊半跏思惟像當為悉達多太子。從這些刻具造像記的例子看來，水野清一提出的兩個論點應該是正確的，一就是太子思惟像的產生可能是受了「過去現在因果經」或「佛所行讚」這類佛傳經典的影響，特別強調釋迦牟尼成道前即有悲天憫人的胸懷，是故在以上二例中，均有與悉達多太子生活密切的蹉跎和車匿的出現；另一個論點為即使沒有造像記，如果一尊半跏思惟菩薩前有一舐足白馬，或車匿啼泣的場面，此菩薩則可斷定為悉達多太子。是以雲岡第六窟明窗附近的兩個佛龕（註四十一），高野山靈寶館收藏的隋四面像（圖十一），趙安香造的半跏思惟像（註四十二）等，都應是太子思惟像。但是，是否誠如水野清一所言，凡樹下半跏思惟像必是太子思惟像呢？筆者對這一點並不完全同意。

水野清一在「半跏思惟像について」一文中提到，「過去現在因果經」云：「爾時太子（悉達多）啓王出遊，王即聽許。時王即與太子并諸羣臣，前後導從，按行國界，次復前行，到王田所，即便止息，闔浮樹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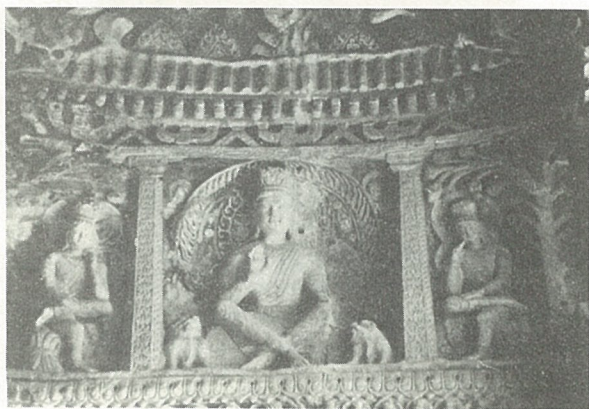


圖十三 交脚彌勒龕 東魏 取自「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
圖版一一九 a



圖十四 交脚彌勒龕背面 東魏
取自「中國佛教雕刻史研究」 圖版一一九 b

看諸耕人。爾時淨居天化作壤蟲，鳥隨啄之，太子見已，起慈悲心，衆生可愍，互相吞食，即便思惟，離欲界愛，如是乃得至四禪地。日光昕赫，樹爲曲枝，隨陰太子。」（註四十三）樹下思惟像即在表現這段經文，此菩薩即悉達多（註四十四）；那麼他背後的樹應該就是閻浮樹。但是由雲岡第十窟前室西壁一屋形龕的雕像（圖十二）看來，却使我們對水野清一的說法產生了懷疑。此佛龕的主尊是交脚彌勒菩薩，它的兩旁脇侍則是樹下思惟菩薩。如依水野清一的看法，這兩位脇侍菩薩當爲悉達多太子。然而，彌勒乃未來佛，當他身爲菩薩靜待其成佛時機圓熟之際，悉達多太子早已修成正果，成爲釋迦牟尼佛了。試問悉達多太子怎麼可以當作彌勒的脇侍呢？此外，一東魏交脚彌勒像（圖十三）的背面也有兩尊樹下思惟像的浮雕（圖十四）；並且在「歷代名畫記」也記



圖十二 雲岡第十窟前室一屋形龕
北魏 照片由 Dr. John
Huntington 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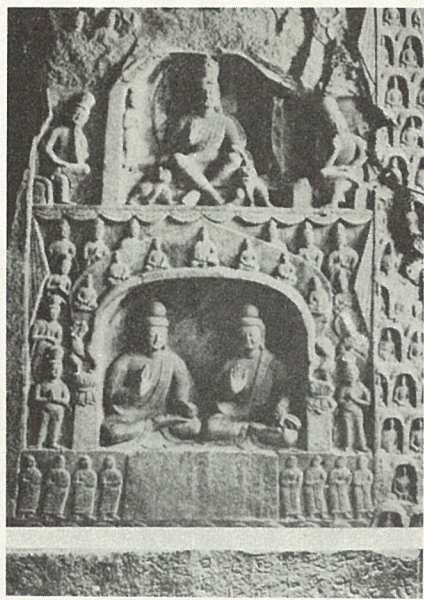
載著，洛陽「敬愛寺佛殿內菩薩，樹下彌勒菩薩塑像，麟德二年（六六五），王玄策取道西域所圖菩薩像為樣。」（註四十五）這些例子都顯示出，樹下半跏思惟像和彌勒亦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而從「歷代名畫記」的資料看來，在西域即有了樹下彌勒像的出現，因而未必所有的樹下半跏思惟像皆是悉達多太子。

從以上的討論可見，有「太子思惟像」的造像記當然是辨識一太子半跏思惟像的最佳證據，可是在沒有造像記的情況下，除非見到白馬告別或車匿啼泣的景象，半跏思惟像背後有樹並不可作為判定此像為悉達多太子的根據。

二、彌勒思惟像

上面已經提到，除了太子思惟像外，半跏思惟像有時也可能是彌勒菩薩。然而在研究中國彌勒思惟像時，却面臨了一個十分棘手的問題，那就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刻有彌勒造像記的中國半跏思惟像。所以，在研究彌勒思惟像時，就不得不從圖像學的觀點著手。前文已論，敦煌二七五窟的半跏思惟像（圖七）應該是彌勒菩薩，茲不贅述。現在僅從其他的雕塑上，談論一些彌勒思惟的問題。

在北魏雕刻中，發現了不少作為脇侍的半跏思惟菩薩，雲岡第十七窟明窗東側佛龕的上層雕刻（圖十五）就是一個例子。佛龕的下面刻有太和十三年（四八九）比丘尼惠定的造像記，它提到此佛龕內的主要三尊像為釋迦、多寶、和彌勒（註四十六），所以下層的二佛當為釋迦及多寶，而上層的主尊自當為彌勒菩薩，彌勒的兩側脇侍則分別是兩位半跏思惟菩薩。這兩位思惟菩薩究竟是誰呢？在佛教美術中，主尊兩側的脇侍往往可視為主尊的變身（manifestation）（註四十七），因此這兩尊思惟菩薩自然可以當作彌勒的變身；換言之，他們亦是彌勒。半跏思惟菩薩既作為彌勒的脇侍，又代表他的變身，這種複



圖十五 雲岡第十七窟明窗東側一小佛龕 北魏 太和十三年（四八九）取自「雲岡石窟」圖八一

雜的關係在雲岡第八窟北壁的佛龕（圖十六）裏看得更加清楚。這個佛龕內原有五尊佛像，然因久經風蝕，如今主尊及其右側的脇侍均已殘損，而最西端的雕像甚而蕩然無存。不過，主尊乃雙足下垂的坐佛，一手作無畏印；它的右側脇侍則是一交腳菩薩，這一切尚依稀可辨。而東端的半跏思惟像（圖十七）仍保存完好，從此佛龕五尊像對稱的安排，最西端原應有一尊半跏思惟菩薩。因而原來五尊像的配置當以垂足坐佛為主尊，交腳及半跏思惟菩薩分列兩側。因為倚坐和交腳坐姿都是彌勒圖像上的特徵，所以此佛龕的主尊是彌勒佛，交腳彌勒菩薩一則是主尊的脇侍，同時又是他的變身。同理推之，半跏思惟菩薩亦是彌勒的脇侍與變身。諸如此類，以彌勒佛或彌勒菩薩為主尊，彌勒思惟菩薩為脇侍的例子在我國早期的佛教美術中比比皆是，例如，一雲岡第二十窟東壁的佛龕（註四十八），東京根津美術館館藏的一北魏四面佛碑像（註四十九）等。有時這種彌勒菩薩像背後還刻畫著一棵樹，如雲岡第十室前壁的屋形佛龕（圖十二），西魏大統四年（五三八）的石造三尊像（註五十）等。這些例子都明白地顯示著，水野清一所言「樹下半跏思惟像一定就是太子思惟」，這個說法未必正確。

「半跏思惟像」再探



圖十七 雲岡第八窟北壁佛龕東端的半跏思惟像 北魏
取自「雲岡」第五冊
第二部分 圖三六



圖十六 雲岡第八窟北壁的佛龕
北魏 照片由 Dr. John
Huntington 提供

樹下思惟菩薩可作彌勒的另一個輔證，是天保十年（五五九）的龍樹思惟像。如今此尊思惟像早已下落不明，只有它的台座還完好無缺地被保存下來。台座上刻有下面這段造像記：「惟大齊天保十年，歲次己卯，二月十五日，像主比丘惠祖，比丘智元像主□□吉母人等敬造龍樹思惟一軀，……」（註五十一）水野清一曾指出，龍樹思惟像即樹下太子思惟像。（註五十二）佐佐木博士不但同意水野清一的看法，並且說，在「阿含經」中人們尊稱釋迦牟尼為龍，故釋迦牟尼的菩提樹可以叫龍樹。同時在「付法藏因緣傳」裡又有「由龍成道，因號龍樹」的句子。因此她以為龍樹思惟當為悉達多太子思惟。（註五十三）乍看之下，她的說法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細查對，卻發現其中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首先，筆者要駁斥佐佐木博士對龍樹的解釋。不錯，「中阿含經」是曾多次尊稱釋迦為龍，可是這並不意味著，釋迦的菩提樹可以叫作龍樹。茲查閱「佛學大辭典」（註五十四）和「望月佛教大辭典」（註五十五），釋迦的菩提樹又可稱為道樹、覺樹、阿輸陀樹、貝多樹等，就是不見龍樹之名。而佐佐木博士引用的「由龍成道，因號龍樹」這句話，見於「付法藏因緣傳」第五卷，文曰：「馬鳴菩薩臨方滅時，便以法藏付一大士，名曰龍樹，然後捨命。龍樹於後廣為衆生流布勝眼，立法幢降伏異道。……（龍樹）託生初在南天竺國出，出梵志種大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道，因號龍樹。」（註五十六）由此可見，文中指的龍樹乃指佛滅度後七百年才出世的龍樹菩薩，而不是佛祖釋迦牟尼。自然地，龍樹思惟乃是太子思惟的這個解釋就頗有疑問了。因為「付法藏因緣傳」所說的龍樹是龍樹菩薩，龍樹思惟是否可能為龍樹菩薩思惟呢？因筆者所見的樹龍菩薩像均不作思惟的姿態，故而認為龍樹思惟為龍樹菩薩思惟的機會大概很小，其恐另有所指，而以為龍樹思惟是彌勒思惟的可能性很大。

「彌勒大成佛經」談到，彌勒將誕生在一婆羅門家，後來出家學道，最後在一「枝如寶龍吐百寶華」的龍華樹下證得菩提。（註五十七）故龍華樹的名稱可能就是因為此樹的樹枝如龍而來的；此外，孔斯（Edward Conze）根據一梵本「彌勒大成佛經」所作的英譯本提到，彌勒將在「一龍樹（Dragon Tree）下得道」（註五十八）。由此可見，龍華樹與龍樹應為同一種樹木，龍樹思惟像很可能就是彌勒思惟像。

「定縣志」記載著另一尊龍樹思惟像，它說：「大魏武定五年（五四七），歲次乙卯三月戊辰朔八日，豐樂七帝二寺邑義人等，慨悼浮俗，生滅難遣，衆行默然，如何自運，故仰為皇帝陛下，師僧父母，遡地衆生，敬造白玉龍樹思惟像一區，詳

崇供養。」（註五十九）此像今天的下落不明，所以也無法從像的本身做進一步的研究。可是根據「七寶瓶銘」，太和十六年（四九二），道人僧暈在七帝寺爲七帝祈福，造三丈彌勒像一尊暨脇侍菩薩，前後費時長達十三年，至正始二年（五〇五）時才大功告成。鑄造主尊彌勒大像，共用赤金三十六萬六千四百斤，黃金二千數百斤；而鑄鑄二脇侍菩薩則耗費了赤金四萬六千斤，和黃金一千一百斤。（註六十）顯而易見，這七帝寺的彌勒像必然十分雄偉，而且工程浩大。因而推測，七帝寺必與彌勒信仰密切相關。是以，七帝寺及它附近豐樂寺的呂義人所造的龍樹思惟像極可能就是彌勒菩薩。

討論至此，我們僅可以援引旁證的方式來探討彌勒思惟的問題，然而我們具體的收穫仍然有限，較有把握的論點也不過是，彌勒思惟常用來作彌勒菩薩的脇侍，也常代表他的變身；而龍樹思惟可能就是彌勒菩薩而非悉達多太子。由於在形象上，彌勒思惟像和太子思惟像完全相同，如沒有造像記或圖像上其他特徵的輔助，實在很難判斷一半跏思惟像究竟是悉達多太子，還是彌勒。

結 論

半跏思惟像源自貴霜王朝的犍陀羅藝術，可是在印度藝術中，這種姿勢一直處於一泛用地階段。隨著佛教東漸，此類圖像亦於西元三、四世紀時傳入中國。到了南北朝，半跏思惟像的發展有了突破性的改變，不但雕造數目劇增，並且它的圖像意義得到了最後的確定，只用來代表悉達多太子，或彌勒菩薩。

觀察現存實例，西元五世紀時，有些中國半跏思惟像被視爲悉達多太子，有些則又被當作彌勒。但是，究竟這種圖像是代表太子在先呢？抑是彌勒在先？查閱經典，「過去現在因果經」、「佛本行讚」等本緣部典籍均頻頻提到，太子悲憫衆生，感於人世無常，而常思惟。（註六十一）但在彌勒經典中，却不見彌勒思惟的記載，故而筆者推測，半跏思惟像似應代表悉達多太子在先，而象徵彌勒在後。只是這種思惟像爲何會用來代表彌勒？由於資料的匱乏，這仍是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值得學者專家們共同努力與研究。

最後，筆者想強調的是，因爲太子思惟與彌勒思惟的造型相同，在沒有造像記或其他圖像學上的特徵時，無論我們稱一

尊半跏思惟菩薩爲悉達多太子、或彌勒，都失之於草率，還不如就叫它爲半跏思惟像，以免犯了遽下結論的錯誤。

註 釋

- 【註一】Roderick Whitfield Ed., *Treasure from Korea* (London, 1984), figs. 94, 95, 96. Kim Young-gi and Others, *Survey of Korean Arts Fine Arts* (Seoul, 1966), Part Two, pls. 3, 4. 相賀徹夫「法隆寺」(東京、一九八二)、頁一三五—一四八。Seichi Mizuno, *Asuka Buddhist Art: Horyu-ji* (Tokyo and New York, 1974), figs. 59, 79, 80.
- 【註二】水野清一「中國の佛教美術」(東京、一九六八)、頁二四三—二五〇。
- 【註三】松原三郎「中國佛教雕塑史研究」(東京、一九七一)、頁二一九—二四八。
- 【註四】Alexander Soper, *Literary Evidence for Early Buddhist Art in China* (*Artibus Asiae Supplementum XIX*), pp. 225-226.
- 【註五】S. F. Moran, "Statue of Miroku Bosatsu of Chūgūji," *Artibus Asiae*, vol. 21 (1958), pp. 179-203.
- 【註六】E. Dale Saunders, *Mudrā* (New York, 1960), pp. 130-131.
- 【註七】Rei Sasaguchi, *The Image of the Contemplating Bodhisattva in Chinese Buddhist Sculpture*, Diss. Harvard University, 1975. 由於不知此作者的日文名字，故暫譯 Sasaguchi爲佐佐木。
- 【註八】水野清一(同註一)頁二四三—二四六。Rei Sasaguchi(同註六) pp. 25, 33, 107-108.
- 【註九】水野清一(同註一)頁二四八。Rei Sasaguchi(同註六) pp. 30, 138-139.
- 【註十】「大藏經」(台北、民國七十二年)，第五十二冊，頁四一七上—四一七中。
- 【註十一】根據「高僧顯傳」，法顯法隆安三年(三九九)西行取經，在義熙八年(四一二)左右，重返中國，於義熙十二年(四一六)壽終而卒。(參見「大藏經」，第五十一冊，頁八五七—八六六)由此推之，吳着鷹必在五世紀初時，由婆羅門僧處得此太子思惟像。
- 【註十二】Martin Lerner, *The Flame and the Lotus* (New York, 1964), pp. 31-32.
- 【註十三】同上，p. 35.
- 【註十四】「大藏經」，第二十冊，頁五上、七中、六十四下等。
- 【註十五】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雲岡」(京都、一九五二—一九五六)第八—九冊，第二部分，圖版十九；第四冊，第二部分，圖版一〇六，二一四；第三冊，第三部分，圖版一一三。Hugo Munsterberg, *Chinese Sculptor* (Rutland and Tokyo, 1960), pl. 4.

- 【註十六】·Yü-Min Lee, *The Maitreya Cult and Its Art in Early China*, Diss. Ohio State University, 1963, pp. 154-157.
- 【註十七】·此像在印度博物館的編目號碼為 Acq. No. A25031, old No. 3747.
- 【註十八】·J. Ph. Vogel, *La Sculpture de Mathura* (Paris and Brussels, 1930), pl. XXXIV-b.
- 【註十九】·貴霜王朝有兩大佛教藝術中心，一為秣菟羅，另一為健陀羅。前者是以本土文化為依歸，故典型的秣菟羅菩薩像皆赤足；後者深受希臘羅馬文化的影響，故健陀羅的菩薩像多著涼鞋或草履。
- 【註二十】·Alexander C. Soper (同註四) p. 226. P. Pal, "The Iconography of Cintamani Cakra Avalokitesvara," *The Journal of Indian Society of Oriental Art*, vol. 2 (1967-1968), p. 44.
- 【註二十一】·參見 Martin Lerner (同註十一) p. 32.
- 【註二十二】·John M. Rosenfield, *The Dynastic Arts of the Kushans*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1967), pp. 191-192.
- 【註二十三】·P. Pal, *Bronzes of Kashmir* (Graz, 1975), p. 234.
- 【註二十四】·蓮花雖是觀音的重要持物，但是當觀音手持蓮花時，蓮花必面向上。此尊菩薩手執的蓮花花苞下垂，與觀音手中的蓮花不同，因此，我們不可因此菩薩手持蓮花，遽然地說它即是觀音。
- 【註二十五】·Harald Ingholt, *Gandharan Art in Pakistan Museum* (New York, 1947), pl. 161.
- 【註二十六】·同上 pp. 99-100.
- 【註二十七】·水野清一 (同註一) 頁四。
- 【註二十八】·同上，頁三——四。
- 【註二十九】·松原三郎 (同註三) 頁三三。
- 【註三十】·Alexander C. Soper, "Northern Liang and Northern Wei in Kansu," *Artibus Asiae*, vol. 21 (1958), p. 160.
- 【註三十一】·Seichi Miguno, *Asuka Buddhist Art: Horyu-ji* (New York and Tokyo, 1974), fig. 62.
- 【註三十二】·水野清一 (同註一) 頁二四八。
- 【註三十三】·東初，「中日佛教交通史」(台北，民國五十九年)，頁三九——五六、三三——三三〇。
- 【註三十四】·松原三郎 (同註三) 圖一一。
- 【註三十五】·同上，圖一三。

- 【註三十六】：水野清一（同註二）頁二四四——二四七。
【註三十七】：同上，頁二四四——二四六。
【註三十八】：同上，頁二四五。
【註三十九】：同上，頁二四六、二四七。
【註四十】：松原三郎（同註三）頁三三八。
【註四十一】：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同註十四）第二冊，第二部分，圖版四和五。
【註四十二】：「鄭州市博物館鄭州市發現兩批北朝石刻造像」，『中原文物』一九八一（二），圖一。
【註四十三】：「大藏經」，第三冊，頁六二九上。
【註四十四】：水野清一（同註二）頁二四五。
【註四十五】：張彥遠「歷代名畫記」（台北，民國六十三年），頁五〇。
【註四十六】：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同註十四）第二冊，第一部分，頁四六。
【註四十七】：David L. Snellgrove, *The Image of the Buddha* (New York and Tokyo, 1978), p. 89.
【註四十八】：Oswald Siren, *Chinese Sculpture* (New York, 1925), vol. II, p. 50.
【註四十九】：松原三郎（同註三）圖版六八〇。
【註五十】：同上，圖版二六〇。
【註五十一】：同上，頁二六二。
【註五十二】：水野清一（同註二）頁二四七。
【註五十三】：Rei Sasaguchi（同註七）頁一〇八——一〇九。
【註五十四】：丁福保，「佛學大辭典」（台北，民國五十年）頁二二三——二二四。
【註五十五】：望月信亭等編，「望月佛教大辭典」（台北，民國六十六年）第五冊，頁四六六——四六六九。
【註五十六】：「大藏經」，第五十冊，頁三一七中。
【註五十七】：同上，第十四冊，頁四三〇中。
【註五十八】：Edward Conze ed., *Buddhist Scriptures* (Baltimore, 1959), p. 240.

【註五十九】：賈恩紱編，「定縣志」（台北，民國五十八年）第三冊，頁九八二——九八三。

【註六十】：同上，第三冊，頁九七六。

【註六十一】：「大藏經」，第三冊，頁六二九中，七〇六下。

「半跏思惟像」再探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

故宮學術季刊 第三卷 第三期

【第六十一】：「大發」，卷二，頁六二。
【第六十二】：同二，卷二，頁六六。
【第六十三】：同二，卷二，頁六八。
【第六十四】：同二，卷二，頁七〇。
【第六十五】：同二，卷二，頁七二。
【第六十六】：同二，卷二，頁七四。
【第六十七】：同二，卷二，頁七六。
【第六十八】：同二，卷二，頁七八。
【第六十九】：同二，卷二，頁八〇。
【第七十】：同二，卷二，頁八二。



國立故宮博物院
NATIONAL PALACE MUSEUM